

The Multiplicity of Language and Identity: A Discussion on the Variations of Mandari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Hongbo Lei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Language serves not only as a carrier of identity but also as a core arena for its construction. However, existing studies often place Mandarin in a simplistic binary opposition to dialects and ethnic languages, or merely regard “local Mandarin” (regional varieties of Putonghua) as an interlanguage variant resulting from insufficient linguistic competence. Grounded in a constructivist perspectiv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n multilingual contexts, individual linguistic behavior is an active practice drawing upon a unified “linguistic repertoire.” Modern identity itself is a multidimensional complex encompassing national, ethnic, and regional affiliation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ocial and regional variations of Mandarin, pointing out that “local Mandarin” has emerged as a crucial intermediary bridging macro-level national identity and micro-level regional sentiments. A rational examination of the complex correla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identity will help guide citizens in constructing a pluralistic yet unified rational identity.

Keywords

language; identity; multiplicity; variation of mandarin; linguistic repertoire

语言与认同的多重性——兼论普通话的变异与认同建构

雷红波

上海大学, 中国·上海 200444

摘要

语言既是认同的载体,也是构建认同的核心场域。然而,既有研究常将普通话与方言、民族语言简单对立,或将“地方普通话”仅视为能力不足的中介语变体。本文立足建构主义视角,认为在多语语境下,个体语言行为是基于统一“语言资源库”的能动实践。现代人的身份认同是涵盖国家、民族、地域等的多元综合体。本文重点考察普通话的社会变异与区域变异,指出“地方普通话”已成为连接宏观国家认同与微观地域情感的重要中介。理性审视语言与认同的复杂关联,有助于引导公民构建多元统一的理性认同。

关键词

语言; 认同; 多重性; 普通话变异; 语言资源库

1 概述: 语言与认同研究的共识与反思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语言与认同的关系受到多个领域的广泛关注。我国相关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近年来随着人口流动加剧,认同已演化为包含国家、民族、地域等多层次的复调结构,语言认同更上升为关乎国家安全与民族团结的战略议题。

国内学界在语言与认同领域已形成若干基本共识:其一,研究范式正经历从本质主义向建构主义的深刻转向,语言被视为构建身份的实践手段而非仅仅是思维外壳(董洁,2016;方小兵,2018);其二,充分认识到语言认同对国家安全、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重要战略影响(赵蓉晖,

2010;黄行,2016;张日培,2018);其三,确认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石(青觉、吴鹏,2020;苏金智,2023)。然而,当前研究仍存在理论瓶颈:核心概念界定有待厘清,语言与认同的动态互动机制未得到深究;跨学科融合不足;普通话常被置于与方言的对立面,其作为通用语的功能属性与丰富变异形态未能充分整合。基于上述发现,本文聚焦普通话的现实变异——特别是“地方普通话”,探讨其如何协调并建构个体的多重认同。

2 理论框架: 认同的多维与语言的实践属性

要厘清语言与认同的关系,首要任务是超越本质主义的视角,将两者还原为动态的社会实践过程。

2.1 认同的复杂性与多维表征

社会心理学对“认同”的认知经历了一个从基础机制向复杂现实不断深化的过程。Tajfel和Turner(1986)的社

【作者简介】雷红波(1975-),女,中国新疆人,博士,讲师,从事社会语言学研究。

会认同理论揭示了认同形成的“类别化—归属—比较”机制，指出群体分类和“内群体偏好”是人类基本的心理需求。这种机制在人类社会早期有助于增强群体凝聚力，划定自我与他者的边界。然而，在现代社会，如果将这种本能的群体归属感极端化、固化为排他性的单一标签，则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

随着全球化与现代化的深入，个体的社会网络高度交叠，身份绝非单一维度，而是复杂多变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 2009）在探讨身份与暴力时深刻指出，单一身份的幻象是导致社会动荡和暴力事件频发的根本原因之一。他通过对比印度的多语主义模式，认为多重身份和多元认同使群体能够以健康、和平的方式适应频繁的跨文化交际；相反，将人们复杂的多重身份简化乃至抹杀为一种极端的单一文化认同，不仅会导致严重的认知失调，更容易催生群体间的仇恨与社会对立。

面对客观存在的多重身份，Roccas 和 Brewer（2002）提出的“社会认同复杂性理论（Social Identity Complexity）”提供了更为精细的分析工具。该理论不仅承认身份的多元性，更深入揭示了个体管理这些身份的动态认知策略。人们并非被动地承受多重身份带来的角色冲突，而是会根据具体情境采取灵活的应对方式：有时是在多个身份的交汇点上寻求共性并加以融合（Intersection）；有时则是将不同身份严格限定在各自的特定领域内互不干扰（Compartmentalization）；或者在特定时刻只凸显某一主导身份（Dominance）。这种复杂的认知管理机制意味着，一个心智成熟的现代公民完全拥有足够的心理弹性，在不同情境下灵活激活不同的身份侧面（如作为跨国企业高管、特定方言区成员或国家公民），而无需陷入“非此即彼”的身份撕裂状态。

2.2 语言认同的界定

语言作为最重要的社会符号系统，在上述复杂的身份建构与管理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基于社会认同及其复杂性理论，本文尝试对“语言认同”作如下界定：语言认同是个体基于对特定语言或语言变体的使用与依附，将自身归属于某一特定群体，并通过与他者的比较以获得情感联系与价值肯定的心理过程。它不仅是族群认同等宏观社会身份的重要维度，更是个体在多重社会互动中动态建构自我、获取群体归属感以及维护自尊的策略性实践。

2.3 语言的变异性与多语话语实践

与之相呼应，当代社会语言学也修正了对“语言”的传统认知，强调其“异质有序”的变异本质。在多语研究中，一个关键转向是超越了传统的“语码转换”视角。早期研究倾向于将不同语言视为彼此独立的离散变体。然而事实上多语使用者并非持有若干套相互隔离的系统，而是拥有一个统一、连续的“语言资源库”（linguistic repertoire）。因此，个体的语言经常表现为一种能动的“多语话语实践”

（multilingual discourse practices）。无论是显性的语码切换、词汇借用，还是隐性的语音微调、语言风格转换，本质上都是说话人根据交际目的和身份需求，从其整体资源库中灵活调用符号资源的过程。

如果进一步追问这种选择背后的社会动力，布尔迪厄（Bourdieu, 1991）关于“语言市场”与“符号资本”的论述提供了极具穿透力的分析视角。不同的语言变体、口音甚至词汇选择，在特定的社会语言市场上被赋予了不同的价值。在正式的制度性场合（如政务、教育、主流媒体），标准普通话具有极高的“显性声望”和资本兑换价值；而在地缘性的非正式场合或青年亚文化群体中，方言或带有地方口音的普通话则可能具有强大的“隐性声望（covert prestige）”，成为建立内部信任、彰显真实性（authenticity）和地方连带感的更有效工具。个体的语言实践实则是对社会语境与语言资本的理性回应。这种能动性，是理解后文普通话变异与地域认同关系的重要前提。

3 普通话的社会变异及其认同功能

在我国的语言认同研究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的地位至关重要。然而，学界和公众常将普通话视为一个固定、绝对的标准，忽视了其在实际使用中的连续体特征。

3.1 普通话的双重属性：标准语与通用语

严格意义上讲，普通话首先是一种超方言的、经过人为规范的标准语，其核心社会功能类似于国际上所称的通用语（lingua franca）。它不是某一特定地域群体的自然母语，而是为打破交际隔阂、凝聚国家共识而构建的公共交际工具。

关于标准语的性质与功能，我国老一辈语言学家早有高瞻远瞩的定论。王力先生（1956）在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曾明确指出，标准语是在民族共同语基础上加工规范的产物，其目的是服务于全社会的共同交际。罗常培、吕叔湘（1956）也在同一会议中强调，“普通”二字的本意即为“普遍通行”，不应带有消极或排斥其他方言的含义。因此，普通话与方言在历史渊源和现实功能中都不应是绝对对立的，普通话的推广是为了“增加一种交际工具”，而非“消灭一种母语”。

3.2 地方普通话：从“中介语”到“认同表征”

随着推普工作的历史性深入，当代中国社会的语言面貌已发生深刻变化，形成了从“标准普通话—地方普通话—趋普方言—纯正方言”的复杂连续体（刘俐李、唐志强，2017）。其中，“地方普通话”现象尤为值得学术界关注。

传统观点常基于语言习得的视角，将地方普通话（如广为人知的“川普”“塑普”“广普”“福建地瓜话”等）视为方言区人群受母语负迁移影响而产生的“中介语”或“偏误”，认为其纯粹是语言能力不足的表现。然而，随着教育的普及，现实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反转：许多90后、00后青

年即使完全具备了说标准普通话的能力,在特定的交际场合(如社交媒体互动、老乡聚会、甚至部分非正式的职场交流中),仍会主动选择使用带有明显方言特征的地方普通话。

这种主动的“降格”选择,深刻揭示了地方普通话在当代社会中的深层功能:它是连接宏观国家认同与微观地域认同的缓冲带与融合剂。在跨地域交际中,使用普通话是基于工具理性和国家认同的需要,确保了信息传递的有效性;而刻意保留一定的语音、词汇地方底色,则是一种微妙的“身份展演(identity performance)”策略。它既保证了沟通的顺畅性和宏观层面的政治正确性,又委婉地宣示了说话人的地域归属感,拉近了交际双方的心理距离。地方普通话的流行,恰恰是“语言资源库”理论在当代中国的生动实践,它表明语言使用者正在高度能动地利用语言变异来协调其看似矛盾的多重身份。

4 宏观与微观语言认同的协调与统一

在多民族、多方言的国家中,如何处理国家认同与民族/地域认同的关系,是语言规划的核心命题。

4.1 正确认识语言的社会功能

语言具有双重社会功能:凝聚共同体成员(融合)与标识群体边界(区隔)。语言差异本属正常现象,但如果被过度放大或赋予单一政治含义,则可能弱化社会团结。阿玛蒂亚·森(2009)批判的“单一身份幻象”提醒我们:将语言与特定身份强行捆绑,无助于多元一体的社会建设。应倡导多元、包容的语言观。

4.2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既是消除信息壁垒、提高交际效率的需要,更是保障公民平等参与国家生活的重要途径,有助于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同时,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并不排斥民族语言和方言。方言和民族语言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特色。通过科学记录与合理转化,将其优秀成分融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语言文化交融的客观规律。

4.3 构建多元统一的认同格局

当代社会中,公民同时承载多重身份:中华民族的一员、少数民族成员、方言区居民、职业群体从业者等。这些身份在不同语境中被分别激活,彼此并不必然冲突。教育及公共政策应引导公民理性认识身份的多重性。既要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筑牢国家认同的文化根基,也要以包容的态度尊重地方普通话和方言的情感价值。应避免将语言与身份的关系简单化、对立化,坚持融合而非分裂、包容而非排斥的原则,构建多元统一的认同格局。

5 结语

语言与认同的关系远比简单的“一一对应”要复杂得多。语言本身是一个充满变异的连续体,而人类的身份认同也是多维交织的复杂网络。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宏伟工程中,我们必须超越“普通话与方言/民族语言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认识到语言行为的多重性,理解地方普通话等语言变体背后的认同诉求,有助于制定更为科学、柔性、包容的语言规划政策。只有在尊重多元文化表达、保障各群体语言权益的基础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才能真正内化为全体国民的情感纽带,从而在多样性中铸就坚不可摧的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参考文献

- [1] 阿玛蒂亚·森. 身份与暴力: 命运的幻象[M]. 李风华,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 [2] 董洁. 语言与认同: 社会语言学的视角与方法[J]. 语言战略研究, 2016, 1(4): 31-37.
- [3] 方小兵. 语言认同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探讨[J]. 语言文字应用, 2018(2): 24-32.
- [4] 黄行. 论中国民族语言认同[J]. 语言战略研究, 2016, 1(1): 25-32.
- [5] 刘俐李, 唐志强. 论当代汉语四阶连续体[J]. 中国语文, 2017(6): 675-685.
- [6] 罗常培, 吕叔湘.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C]//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6: 43-53.
- [9] 苏金智. 中华民族共同语: 概念形成与地位功能演进[J]. 高校文科学术文摘, 2023, 40(3): 143-144.
- [10] 王力. 关于汉语规范化问题[C]//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6: 33-42.
- [11] 张日培. 语言政策视角下关于语言产业的若干思考[J]. 语言产业研究, 2018(1): 24-30.
- [12] 赵蓉晖. 国家安全视域的中国外语规划[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42(2): 1-5.
- [13] BLOMMAERT J.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Globaliza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14] BOURDIEU P.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M]. RAYMOND G, ADAMSON M, trans. THOMPSON J B, e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16] ROCCASS, BREWER M B. Social identity complexity[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002, 6(2): 88-106.
- [17] TAJFEL H, TURNER J C.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M]//WORCHEL S, AUSTIN W G.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Chicago: Nelson-Hall, 1986: 7-24.